

# 元末明初鄂西地区土司归降策略

## ——以施南、唐崖、金峒等土司为例

覃苙坤

(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元末明初朝代政权更迭之际,施南、唐崖、金峒等鄂西地区土司在中央王朝与周边大小反抗势力的斡旋中,其政治态度往往显得“叛服不常”。在不同形势下,众土司使用的归降策略不同,主要表现为其自身利益与血缘姻亲纽带下的见利倒戈、同叛同降策略,投降新主时的上缴旧印策略,以及归降后重赢话语权以便继续进行合法统治需求下的更易名称洗去劣迹策略。

**关键词:**元末明初;土司;归降;策略

**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18)02-0103-04

元明之际,西南地区土司林立。作为古代在西南地区推行的行政管理制度,土司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其独特性。历史上的鄂西,主要包括恩施、五峰、长阳等土家族苗族聚居地。研究元明时期鄂西诸土司的归降策略,实际上是探讨其作为一种地方性的政权与国家政权之间的交互关系。从明初鄂西土司与中央政权的关系来看,其中无疑涵盖了国家认同下的土司统治与合法化进程。而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与中原地区汉文化相互交流融合,交相辉映。作为巴楚文化衍生与象征的土司文化,在政治、经济、文化、权利、承袭中自成一体,其更是民族文化的瑰宝。近年来兴起了一股研究土司文化的热潮,李世愉在《关于构建“土司学”的几个问题》一文中阐述了建构研究土司问题专学的理念,方铁在《土司制度及其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中论述了土司制度及其文化的重要性,而田敏《元代鄂西南土家族诸蛮洞及土司史迹考》、陈文元《论明初蓝玉征鄂西与鄂西土司社会变革》则从不同方面,论述了鄂西南地区土司设置格局,及鄂西地区土司与明代中央王朝的征战。目前学界尚未对明初鄂西诸土司的归降策略做过专门性研究,且对于施南、唐崖、金峒等土司基本世系承袭与族源尚未明确,具体分析和探讨鄂西地区相关土司的归降策略,且厘清施南、唐崖等土司的宗法血缘

关系,对鄂西地区相关土司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亦可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

### 一、见利倒戈,抱团归附

长期以来,土司与中央王朝之间形成了一种叛服交替的制衡关系。在辖地范围内拥有管辖权利和军事力量的西南众土司,往往并不安分,表现出叛的倾向。据道光《施南府志》:“永乐二年,令守臣招抚,不意渐徙内地,如施南、金峒等司,则入施州地矣。宏治间,忠路、忠孝又徙施州都亭等里,施南、唐崖又侵黔江之夹口。”而当形势变化,兵败之时,土司则会选择归降服从,以延续势力,求得生存。至元二十二年,“蛮獠叛服不常,诏四川行省讨之……诸将凿山开道,绵亘千里,蛮獠设太险隘者,尽杀之。遣使谕其酋长皆率众来降,独散毛洞潭顺走入岩谷,力屈始降”<sup>[1](P333)</sup>。鄂西众土司正是在这种微妙的政治关系下,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政治生存策略。随着朝代更替,诸土司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存亡兴衰,中央王朝政权的更替对其世袭与建制等均未有致命影响,对于西南诸土司而言,只不过换了一个归顺与上贡的新主而已,所以在元末明初之时,西南诸土司见利倒戈,叛服不常,且因为诸土司存在血缘、隶属等宗法关系,所以其叛乱往往同进同退,集体反叛,失败以后又抱团归附。

对元末施南土司的叛与降,清光绪《利川县志》中有明确记载:“施南土司元初置镇边总广府,至元二十三年改忠义安抚司,至正二年叛,都元帅纽璘谕,降之,改施南宣抚司。明玉珍据蜀,改宣慰司。”<sup>[2](P471~72)</sup>也就是说,其在元末的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叛乱与投降后,又在十多年后明玉珍占据蜀地时,因为授予其更高级别的宣慰司,在利益的驱动下,其便直接依附过去。对此,《新元史》亦有详载:“明玉珍据重庆,屡遣人招绍荣,许以民爵,不应。及遣将来攻城,绍荣败之。时副元帅覃川隆密受伪命,以城降。”<sup>[1](P444)</sup>时任元帅的尚绍荣,在大夏明玉珍许以重利与爵位的诱惑下不屈,而时任施南宣抚司宣抚兼副元帅的覃川隆,在利益与爵位的驱使下,接受了明玉珍的勅封,瞒着尚绍荣接受了“伪命”,以城投降后,使得元帅尚绍荣无城可守,不战而败。

位于湘渝鄂交界处的施州地区,元明以来土司林立。其名义上归顺朝廷,实际上按照姓氏自成一体,拥兵自重,算是国中之国,对其百姓拥有生杀大权,叛乱时抱团共犯,投降时更是抱团归附。鄂西地区自古就有“七覃,八田,二向,一黄”之说,学界向来仅知“七覃”,其实在元明之时,确切来说,施州地区长官司以上的覃姓土司包括八个,为施南、散毛、金峒、忠路、东乡五路、唐崖、镇南、石关峒。这些土司之间存在同源与隶属关系,例如“宣德二年秋七月丁亥朔……设湖广石关峒长官司,隶金峒安抚司,以覃万勇为长官,向显铭、牟福亮、谭仲贵为副长官”<sup>[3](P757~772)</sup>。东乡、忠路、金峒则隶属施南,唐崖、镇南虽直属施州卫,但都与施南存在血缘关系。正因为这些土司的共同血缘、宗法或隶属关系,其在明初归顺之后,通常抱团反抗:“凉国公蓝玉克散毛洞,擒刺惹长官覃大旺等万余人。置大田军民千户所,隶施州卫。以蓝玉奏散毛、镇南、大旺、施南等洞蛮叛服不常。”<sup>[4](P5348)</sup>施南、散毛、东乡、唐崖等土司在洪武四年归明以后复叛,经过蓝玉征战后废弃,在永乐二年到五年间,又以“故官子侄入朝,奏请复设各废司”,集体叛乱后,施南土司又与其他同姓、联姻或有隶属关系的土司抱团归附明朝。

## 二、上缴旧印,以表归顺

土司官印是其权利的象征,中央王朝往往通过授予官印的方式安抚土司,承认其统治的合法性。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元中央王朝“擢邦光子为管军总管,佩虎符,赐散毛酋金银符各一”<sup>[1](P359)</sup>。正因为土司官印代表权利和地位,故在土司世袭更迭之时,血亲之间往往会发生争印夺权之事。《明

史》载:“都察院议,金峒安抚上舍覃璧争印相杀……四年,覃璧作乱,伤官军。”<sup>[4](P5351)</sup>土司官印虽极为重要,然而众土司在面临中央政权更迭,改朝换代之时,为保生存,延续其在西南地区各辖地范围内的统治,便往往选择“纳印归顺”。这一现象,在正史或者土司后代家族的谱牒中,皆有清晰的记载,“元施南道宣慰使覃大胜弟大旺、副宣慰覃大兴、光宝子答谷等皆来朝,纳元所授金虎符。”<sup>[4](P5347)</sup>如唐崖:“一世祖覃启处送,元时有功,顺出军门,纳印归顺。”<sup>[7]</sup>如散毛土司:“洪武五年,散毛宣慰司都元帅覃野旺上伪夏所授印。”<sup>[5](P454)</sup>值得一提的是,唐崖土司的覃启处送,乃是施南土司覃大胜之二弟,原名覃大兴。其先为施南宣慰副元帅,而后还做过镇南司长官。其子覃值在唐崖为安抚使,洪武七年改为长官司。同治增修《施南府志》载:“唐崖长官司,元唐崖军民千户所。明玉珍改安抚司。洪武七年四月改长官司,后废。永乐四年三月复置,直隶施州卫。”<sup>[6](P255)</sup>学界亦对唐崖世系有过大量研究,却一直不知覃启处送的真实姓名,因下文有专门论述,此不赘述。总之,在元末明初不管是施南土司,还是元至正年间才开始兴起的唐崖土司,皆纷纷纳印归顺。

土司作为土官世代承袭,当遇到朝代更替时,其往往审时度势,纳印归顺新主,以表归顺之心。作为土官的土司与流官不同,流官是朝廷派遣任命,而土官则世代世袭。土司归顺新主之后,须定期向朝廷进贡。对于土司进贡,中央朝廷往往给与其政治和权力上的应允作为赏赐,所以土司很热衷于进贡。土官进贡除了亲自上贡外,还会遣与其有血缘和姻亲关系之人例如子嗣或舍人去上贡。《明太宗实录》载:“永乐三年夏四月丙寅朔……湖广梅南长官司土官之子覃添富来朝贡马及方物,请恩以新设二治故也。”<sup>[7](P669~673)</sup>《明宣宗实录》载:“宣德伍年八月己巳朔……湖广施南宣抚司土官宣抚覃逊,遣舍人黄昌,前池着洞长官司等衙门故土官长官向铁钟,子海栋等贡马及方物。”<sup>[3](P1615~P1622)</sup>土官上贡亦往往抱团上贡,《明宣宗实录》载:“宣德五年冬十月戊辰朔……四川石柱宣抚司把事向添林,湖广黔南道宣慰司故土官宣慰使覃国钦,子宣等,来朝贡马及方物。”<sup>[3](P1655~P1660)</sup>在归顺之后,土官世代相续,同时会得到朝廷象征性的任命承袭,《明英宗实录》:“正统二年十一月丁亥朔,命故湖广施南宣抚司宣抚覃选,子彦昇。东乡五路安抚司安抚覃信,子玉俱袭职。”<sup>[8](P697~698)</sup>对于施南土司承袭制度的探讨,离不开对其世系的梳理,有必要提及的一点是,在乾隆版谱牒记载中的世系,缺失了几代。依据《明实录》来

看,川龙之后为大胜,大胜之后为添富,覃添富之后为覃逊,而后则为国钦,之后则为覃选,据此,亦可以补充其世系的空白。

当上缴旧印以表归顺之心后,朝廷会赐给新印,之后土司就会开始朝贡,以获取朝廷的赏赐。而朝贡对于经济落后的土司来说,不仅是其经济来源之一,也是其归顺之后,表达政治态度的一种象征,故众土司亦会纷纷抱团,且定期向朝廷进贡。

### 三、更易名称,洗去劣迹

有关元末明初施南司主改名一事,由于此事本身的隐秘性与年代久远,掌握的资料有限等,一直未见学界提及。历史上改朝换代,更易姓名,并不鲜见,但在元明之交土司作为西南少数民族实际的最高统治者,其当时的更名现象和政治归降策略,不仅给如今的土司世系研究造成了混乱,甚至给整个西南少数民族的族源认证与巴文化的研究,皆带来了较大的困难。例如因族谱中蒙古姓氏和更名现象的记载,唐崖土司一直就存在“蒙古后裔”一说,认为其先世来源于蒙古族,且在学界争议不断。然而,从当时来看,更易姓名却是鄂西地区土司的一种归降策略和统治需求,也是一种政治智慧的表现。施南土司因元末投降明玉珍,当大夏政权被颠覆后再降明,这对于施南土司来讲,是政治上的一大瑕疵,其更名的原因可看成是降明之前的一种策略,是考虑到投降明朝以后,其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合法统治者继续施行政治统治的需要。

元末施南司主覃川隆更名为覃古诸,覃大胜更名为覃耳毛,覃大旺更名为覃野毛,覃大兴更名为覃花毛,且有绝对的证据可寻。按《明史》:“洪武四年……元施南道宣慰使覃大胜弟大旺、副宣慰覃大兴……皆来朝,纳元所授金虎符。”<sup>[4](P5347)</sup>清道光《施南府志》卷之二附雷思霈《施州卫方輿书》载:“施南宣抚司……自洪武四年覃耳毛始。”而清光绪《利川县志》亦载:“明洪武四年……施南宣慰使覃大胜,弟大旺,副宣慰覃大兴……皆来朝,纳元所受金虎符,命仍以大胜为宣慰使”<sup>[2](P471~472)</sup>在洪武四年,实为一人的施南宣慰使在正史、地方府志与县志中用了不同的名字,可以得出覃耳毛实为覃大胜。另有谱牒方面的更名证据,唐崖镇老鹰岩民国版覃氏谱牒载:“普珠祖……所生三子更名覃耳毛,次子野毛,三子花毛。因洪武新得元朝天下,山海犹未升平。”另据乾隆版施南《覃氏家谱》:“覃川龙……生子大胜、次子大旺、三子大兴。”所以据以上综合可以得出,不仅覃大胜更改过名字,且其父覃川龙(隆)更名为覃普

诸,而覃大旺、覃大兴则分别更名为覃野毛、覃花毛。需要指出的是,“毛”实指“蛮”,“即指未‘归化’之‘蛮族’”,乃对少数民族酋长的惯用称谓,后代谱牒追述先世也惯用此类名称。覃川隆改名的原因是,曾经作为施州副元帅的他“密受伪命”献城投降了大夏的明玉珍,后来归顺明朝之后,此事显得极不光彩,因此更名。为此,明朝初年陈德芳还讥讽过覃川隆。道光《施南府志》载:“洪武四年,明师伐蜀,德芳讽施南土司覃州隆降。”再根据《明太祖实录》:“洪武十六年冬十月辛未朔……施南宣慰使司前宣慰覃古诸,来朝贡马及方物。”<sup>[9](P2433~2440)</sup>按照时间来推定,洪武四年施南覃大胜纳印归顺明朝,到洪武二十三年覃大胜作乱,凉国公蓝玉擒之,所以覃大胜在职期间,上贡的施南宣慰司前宣慰只能是其父,所以洪武十六年的覃古诸只能是归顺明朝的覃大胜之父覃川隆,也就是谱牒上所载的覃普诸。作为洪武初的施南宣慰司前宣慰,虽然覃古诸与覃普诸在族谱与正史记载中名字稍有出入,但显然为同一人。唐崖老鹰岩民国版覃谱载:“花毛公授宣慰印住唐崖。”而覃花毛长期被人称为覃启处送,则其真实姓名则为覃大兴,亦可以直接说明唐崖族谱里记载的蒙古族起源是伪事实。关于唐崖土司的族源问题,可参看拙文《唐崖土司“蒙古族后裔探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视域下的蜕变》<sup>[10]</sup>,而现今学界公认的唐崖土司世系中的第三世覃耳毛,也是后世因修谱时与施南世系混淆乱入的,所以应当略去。《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四年十二月庚辰朔……故元施南道宣慰使覃大胜,弟大旺,副宣慰覃大兴。”<sup>[9](P1295~P1308)</sup>清乾隆施南《覃氏家谱》载:“永乐二年……公叔镇南长官覃大兴同唐崖长官覃忠孝入朝,命忠孝袭父祖职,为唐崖安抚,而大兴仍为镇南长官。”以上可以得出,作为唐崖司启祖的覃大兴,元朝末年为施南道宣慰司副宣慰,并作过镇南长官,永乐初与其孙覃忠孝一同入朝奏请袭职。《明史》载:“永乐……五年……既复设忠路、忠孝、金峒三安抚司,隶施州卫,以覃英、田大英、覃添贵为之。”<sup>[4](P5349)</sup>而金峒覃添贵乃是施南宣慰使覃添富之二弟。所以,这进一步证明,施南、唐崖、金峒等土司是有直接血缘与宗法继承关系的,而更名只是其归降明朝的一种策略。

施南乾隆版谱牒记载,覃伯坚是来施州的第一人:“覃伯坚……庆元丁巳(公元 1197)……封行军总管,诣任施州。此者我覃氏施州之族所由昉也。”这和正史记载出入很大,《鄂西土家族简史》(初稿)已经对此有过明确的描述:“覃谱记载好像施州覃姓,均是覃伯坚之后,而其他各史记载,在覃伯坚来



施州之前,覃氏就较盛。覃文勇参加溪州会盟比覃伯坚来施州早一百八十年,覃彦馆进攻永宁砦,比覃伯坚来施州早160年。”溪州会盟一事,刻录在五代晋天福五年(公元940)的溪州铜柱之上,其载“知富州军州事覃文勇”<sup>[11](P28)</sup>。富州之地就是以后的散毛土司辖地。而进攻永宁砦则载于《宋史》卷四百九十三西南溪峒诸蛮(上):“天圣……九年,施州属蛮覃彦馆等寇永宁砦。”<sup>[12](P14183)</sup>道光《施南府志》卷之二附雷思霈《施州卫方輿书》载:“宋崇宁中覃都管马始纳土输赋,令隶施州。元置镇边万户总管府,至元二十三年改忠义军民安抚司,至正二年叛,都元帅纽璘谕降之,改施南宣抚司。”此覃都管马,亦比覃伯坚来施州早三十年左右,所以对待土司后裔的谱牒,研究者应结合正史,采取辩证的历史观,去伪存真。通过谱牒与正史、方志的对比可以得出,土司为了显示其正统性与合法性,其谱牒资料叙述其先辈多是从中原一带迁来,且言其征剿蛮夷有功,落业安营世袭其职。其实,这只能当成溢美之词,准确地说其先世也多为土著,诸如此类的美化之词多为其信仰,应辩证对待。

通过正史与民间谱牒记载的对比,元末明初作为鄂西地区实际掌权者,土司更易名称的痕迹以及取得合法统治权与话语权的过程得以清晰。作为一种归降策略,其更名亦是为了清除其在“叛服不常”上犯下的“过错”,以便在改朝换代之后,继续以合法者的身份统治其辖地。

通过上述几点可以得出,鄂西地区土司在中央王朝政权更迭之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归降策略。

为了合法统治与承袭,土司选择更易名称,而土司后裔族谱在修订过程中更凭借传说与信仰另立祖先,这给整个土司世系与其族源研究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历史上中央王朝对待土司常以蛮夷视之,而就土司的屡叛屡降行为,也并非是要对其品性做道德上的判定,其降与叛只不过是基于一种政治术的生存智慧。土司研究属于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关注的范畴。我国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作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土司在申遗成功之后,更成为整个人类共有的文化遗存。鄂西南是我国土家族、苗族聚居之地,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域,土司相关研究亦是巴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对于研究整个西南的地方史、边疆史和少数民族历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参考文献:

- [1]柯劭忞.新元史[M].上海:开明书店,1935.
- [2]黄世崇.利川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 [3]明宣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1962.
- [4]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5]松林,周庆榕.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57·同治来凤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 [6]松林.同治增修施南府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 [7]明太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1962.
- [8]明英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1962.
- [9]明太祖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1962.
- [10]覃荏坤.唐崖土司“蒙古族后裔探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视域下的蜕变[J].中国民族博览,2017(12).
- [11]谢华.湘西土司辑略[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2]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

## The Chieftains' Surrender Strategies of the Western Hubei Province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aking the Chieftains of Shi Nan, Tang Ya, Jin Dong for Example Qin jiangkun

(School of Literatur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430074)

**Abstract:** During the occasion of the dynastic regime change period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Ming dynasties, the chieftains of Shi Nan, Tang Ya, Jin Dong in western Hubei province turned out to be “often changing between obedience and betray”, when they were mediating and struggling with the Central dynasty and the around opposition powers.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the chieftains used different strategies of Surrender. This strategies were reflected in the chieftains' choices of common rebelling and joint surrendering because of their own interests and blood affinity relationship, and in the behavior of handing over the old stamp when they surrender to the new emperor. Also, this strategies reflected in changing their names to remove bad effects and to win the right to speak, then the chieftains could continue to rule their area in a legal way.

**Key words:** Late Yuan and early Ming Dynasty; the Chieftain; strategies of Surrender